

西方马克思主义 文学批评形态研究



XIFANG MAKESIZHUYI
WENXUE PIPING XINGTAI YANJIU

王庆卫 著

非外借



人民出版社

西方马克思主义 文学批评形态研究

XIFANG MAKESIZHUYI
WENXUE PIPING XINGTAI YANJIU

王庆卫 著

飞 水 欣 社

责任编辑:张 立

装帧设计:姚 菲

责任校对:陈艳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形态研究/王庆卫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9

ISBN 978-7-01-019413-4

I. ①西… II. ①王… III. ①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研究 IV. ①I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19389 号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形态研究

XIFANG MAKESIZHUYI WENXUE PIPING XINGTAI YANJIU

王庆卫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25

字数:330 千字

ISBN 978-7-01-019413-4 定价: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绪 论 理论旅行中的批评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形态刍议	1
第一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批评形态	16
第一节 人类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and 意义	17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对艺术的关注	22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批评问题域之一:艺术起源	25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批评问题域之二:艺术功能问题	45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批评问题域之三:文化批评理论的建构	51
第六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批评视野中的文化批评理论	62
第二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批评形态	122
第一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批评的演变:从革命政治到文化政治	123
第二节 政治批评:“过渡性政治”及其文学批评形态	137
第三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	177
第一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意识形态观念概貌	178
第二节 阿尔都塞与马歇雷的意识形态批评	199

第三节 价值、观念和幻象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批评 211

第四节 对“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批判：詹姆逊的意识形态批评 223

第四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批评 246

第一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批评的不同路径 249

第二节 布莱希特与本雅明：艺术生产批评的政治经济学路径 260

第三节 阿尔都塞与马歇雷：艺术生产批评的哲学路径 284

第四节 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生产论” 309

结 语 330

《《《 绪 论

理论旅行中的批评意识：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形态刍议

西方马克思主义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至今已 30 余年。中国学术界早已抛弃最初的“西马非马”的独断认识,转而对其思想成果抱以极高的研究热情和积极的认同态度。但在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厘定上,一种隐约的犹疑仍不时显现:当谈到马克思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最深刻的洞察在当今时代的影响力时,我们倾向于认可二者的统一;而涉及西马的理论归属问题时,则不忘记强调二者的疏离。除了学术立场和意识形态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身理论形态的多样性和理论来源的复杂性确实带来了定位难题。纵观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与发展历程,它们是一系列由西方现代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相遇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根系植根于时代的土壤之中而结出的理论果实。相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所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原生形态而言,它们无疑带有某种疏离的姿态;然而就马克思主义作为开放和发展的体系、立足实践并解答现实问题而言,它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域、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同程度的恪守与坚持,又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相符。

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的传播过程中,形成了几个最重要的理论模式,即苏联马克思主义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模式、东欧马克思主义模式和新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模式。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当代社会问题相适应并与西方学术思想发展同步,先后出现了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派的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的产生,正是马克思主义原典在不断变化着的政治和社会情境中被重新诠释,发生了时间、空间和学术领域的位移。马克思主义原典中的不同理论要素依据理论所在的时间和空间的具体实际,或被强化,或被抑制,或被重释,或与异质性的理论相结合,呈现出参差多态的思考路径和学术走向。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哲学基础与使命意识

韦勒克在《20世纪文学批评主潮》一文中,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列于20世纪六种主要的文学批评首位^①;但与其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一门研究文学作品的社会决定因素的客观科学”,“在揭示文学作品潜在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内容方面,独擅胜场”^②,不如说它是一种“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社会使命意识的文学批评”更为恰当。它不仅在哲学基础上有别于正统马克思主义批评,也在以批判资本主义现实和追求人类解放的使命意识上有别于其他类型的文学批评。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社会、艺术、审美和文化现象作出的考察和评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社会使命意识在文学批评中的体现。它与当代资本主义人文社会思想和文学美学理论展开历时性的交锋、碰撞并彼此吸收,从而开启和激发出新的理论视域和学术生长点,生成了各种批评话语和批评形态。

经典马克思主义为考察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方法、视角和问题域,深刻剖析了早期资本主义的现实状况和基本矛盾,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死亡

① 参见[美]R.韦勒克:《二十世纪文学批评主潮》,丁泓、于徵译,载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27页。

② [美]R.韦勒克:《二十世纪文学批评主潮》,丁泓、于徵译,载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28、330页。

和如何死亡;但时至今日,资本主义的丧钟并未敲响。历史从19世纪末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进展到当今的“后资本主义时代”,在社会形态、阶级关系和政治经济方式等很多方面,溢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或“正统的”解释。经典马克思主义能够准确把握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和固有矛盾,却不可能预见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中的新变化:科技革命、知识经济以及社会福利的改进,更无法想象资本主义通过吸收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采取制度变革,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遗嘱执行人”^①。在整个20世纪,随着文献的发现、社会形势的变化和学术思想的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纷纷寻找现实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结合点,寻求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原则和方法与当代西方理论话语接轨,以开展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从而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特征和阐释力。因此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是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观察者和批判者。

在文学批评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从人类学、意识形态、艺术生产与政治学等诸多维度深入探讨西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发展状况^②,揭示其观念、风格和形式等要素与时俱进的变化,由此形成了相应的批评视野和批评形态。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流派和形态多样,但其马克思主义属性仍可以从它们的基本主张中辨认出来,它是一种有着历史使命意识的文艺批评,是从无产阶级的理论任务中提出的文学批评和美学理论任务,拥有不同于其他文学美学批评的鲜明特征,就像英国学者马尔赫恩所指出的:

“‘马克思主义’可以用恩格斯晚年所用的那些方式来表述:(1)关于生产方式的一般理论、生产方式发展的形式、危机和变形、人类历史中生产方式的

① 陈学明、黄力之、吴新文:《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答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十大疑问》,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页。

② 冯宪光先生在《20世纪西马文论本体论的主要形态》等文章中指出:“20世纪西马文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元化本体论思想的指导下,展现出人类学文论、意识形态批评文论、艺术生产文论与政治学文论等四种具体的理论形态。”《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4期。本书从此说,认为这一划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同样有效。

结构作用;特别是:(2)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资本主义的主要阶级以及它们之间的对抗、工人阶级反抗资本的斗争之间的有机关系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可能性。这些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构成性主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结构得以产生的‘真正基础’。它们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题目的最低标志,是马克思主义使自身富有意义,从而确认一种连续的传统的核心因素。”^①

奠基于这一基础之上的文学反映论、文学意识形态论、艺术生产论、美与实践的关系、艺术与人的关系等问题,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共同的基本问题和遵循的出发点;它们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特征所在,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据以考察 20 世纪新出现的文学问题的基本视域。

文学批评理论的形态及其所能达到的高度,取决于它们所依据的哲学的形态和高度。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发端伊始,即从哲学基础和思想路径上与主流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及当时流行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存在巨大的分野。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把经典马克思主义主要看作一种社会理论或经济学理论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如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哲学,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力量源泉;第三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其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其基本内容就是物质本体论、唯物主义反映论和把人类历史理解为自然史的历史观”^②;西方马克思主义则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近代哲学的陈旧命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主客体统一的实践哲学,以实践性、历时性、总体性为特征;近代哲学把整个世界作为自己对象、力图把握所谓“绝对本质”,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唯物主义为立场,以实践为核心,早已在思维方式上完成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它的研究重心是人类社会,以人的价值和人的自由的实现为对象,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

① [英]马尔赫恩:《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陈永国、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 页。

② 陈学明主编:《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第一卷),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导论第 3 页。

说；如果仅仅从近代哲学出发认识马克思主义并将其理解为社会哲学或社会理论，则等于把自己哲学的落后性重新带入到马克思主义中。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和美学观念就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认识而产生的。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以及阶级斗争理论的文学批评观点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美学则往往以“青年马克思”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异化劳动理论为出发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拒斥辩证唯物主义，多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实践本体论，强调主观因素和阶级意识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从而显示出哲学基础、思想内容和理论形态上的巨大差异。西方马克思主义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任务转向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因此特别重视文化和艺术，认为它们是超越一切的力量，是唤醒无产阶级意识和实现内在革命的唯一途径；因而他们对文学批评和美学理论格外重视，相关理论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都是具有深厚的美学理论和文学艺术素养的学者，他们多秉持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哲学阐释，高扬无产阶级主体性，以揭露和抵抗资本主义异化为己任；在文艺思想上强调以审美和艺术作为人的感觉的解放的途径，主张“文化心理革命”和“意识革命”并倡导无产阶级夺取文化领导权，因而注重考察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突出文化哲学和社会文化批判的重要性，强调文学艺术和美学的社会功能。这些主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的后世发展立定了基调，也使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以此区别于从经济关系、阶级关系考察文学、以美学的和历史的的标准来衡量典型人物创作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观。正如佩里·安德森所指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说来，似乎令人困惑地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轨道。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不断从哲学转向政治学 and 经济学，以此作为他思想的中心部分；而 1920 年以后涌现的这个传统的继承者们，却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①它们通过现代哲学的视

^①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锴、文贯中、魏章玲译，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8—69 页。

角和理论路径去观照、印证、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保持强大的理论生命力,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同步于时代的、能与各种前沿哲学和社会学理论进行对话的开放思想体系。

二、范式转换,还是理论旅行

国内一些学者喜欢用“范式转换”这样的术语来描述上述情形,但“范式”这一概念在此处是否恰当,是个颇值得深思的问题。从范式的本义来考察,库恩在《必要的张力》(1959)一文中首次使用“范式”一词,后来在论文《对范式的再思考》中重新归纳了“范式”的涵义,指“一个科学群体所共有的全部承诺”或“把其中特别重要的承诺抽出来,成为前者的一个子集”^①,“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同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并无任何共同之处”^②。范式概念主要用于解释自然科学史的理论变迁,指常规科学赖以产生的理论基础和知识框架,也是某一科学群体所共有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

范式概念被库恩运用于自然科学研究,科学的发展也是范式转换的过程。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对这一概念的借用实际上缺乏必要的论证,范式及其所关涉的一系列观念不应被假定为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同样有效。库恩认为,自然科学范式具有突现(emerge 或者 emergence)和不可通约等特征,即不把新旧两种范式之间的关系看作渐进积累的过程,而是认为转换之后的范式与先前范式没有共同的目标、价值和衡量标准,其理论形态差距之大,犹如化学史上关于燃烧的解释的“氧化反应”之于“燃素论”。如果说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仅仅借用了范式这一称谓,而并不接受意义突现和“不可通约”等规定性,则这一概念的借用毫无意义。

后来库恩在《必要的张力》一书中特别强调了“符号概括”、“模型”和“范

① [美]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范岱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8页。

② [美]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范岱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8页。

例”这三个内涵来说明范式:“要了解一个科学共同体怎样起生产和证实可靠的知识的作用,我想,归根到底就是要了解专业基体这三种成分的运作。”^①符号概括、模型和范例,是科学家群体基于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共识而接受的那些相互支持的假设、观念、理论和方法。符号概括即以数字符号和逻辑符号的形式对该范式的基本理论加以表述。模型则用来对具体现象加以认知性的解释,为科学研究提供精选的类比,“可给人们启发:可以把电流回路看成是稳态流体动力学系统,或者把气体行为像微型台球那样随机运动。”^②范例,亦即共同体的典型事例,是为了演示如何运用基本理论解决具体问题而给出的示范,是通过一些具体问题的解答而形成的一个学科内的意会知识(一个时期解决科学问题的学科观念、思维习惯)。粗看起来,似乎在“范例”的意义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尚能找到共通点,但实际上,自然科学领域在某个时期共享一个范式,而人文社会科学则流派林立,缺少共享的信念、概念和价值。对此,学者韩东屏指出:“倘若哲学真有范式,首先这将意味着哲学研究者们已经有不分国别、学派的‘共同的基本理论’。可是自古以来,一直连自己的研究对象都说不清楚,而且也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共识性哲学定义的哲学,何曾有过这种东西?”^③范式的这三个基本特征都显明了它的自然科学属性,而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理论中鲜能找到类似之处。

由此看来,无论用“范式转换”来描绘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还是描绘西方马克思主义诸流派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合适的:

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原生形态之间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各种流派主张之间,有着复杂却清晰的逻辑线索和历史脉络,而且有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如意识形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实践等一以贯之,构成了共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域,它们的产生远非“理论的突现”,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完全不是“不可通约”的;若在马克思主义作为无限发展的思想体系的意义上,把从马克思主义原生形态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看

① [美]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范岱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5页。

② [美]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范岱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5页。

③ 韩东屏:《哲学有范式吗?》,《理论视野》2009年第10期。

作某个总体的思想范式的建构过程,倒似有几分合理。

其次,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际状况来看,与其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诸流派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范式转换,不如说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出发的一种理论延伸、拓展和再阐释,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承传形态。人文学科理论建构注重历史积累,其观念革命并不意味着旧概念的失效,而更多关乎价值的重建。动辄曰“范式转换”,实际上忽略了库恩本意中新旧范式的不可通约之规定。相比之下,赛义德“理论旅行”之说来得更妥帖。

最后,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批评理论看作“范式转换”还显露了一种未经反思的正统意识,即把列宁主义——第三国际——苏联意识形态所体现的教科书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脉络,而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看作形形色色的理论变体。实际上,未经解读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应看作一个处于自在状态的理论对象,其范式如何则有待于阐发,它不会自身展开为任何范式。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则都是在现实条件下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时性阐释和发展,经典是源,“东”、“西”马克思主义皆是流,既然在阐发之前无法获知原始的范式,也就不应特意指出哪种阐发是范式的延续,哪种是范式的转换;如果把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新观念和新形态都归为范式转换,则这一概念会因所指过宽而失去意义。

不顾范式概念的规定性而强行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中使用,是出于对名词的偏爱而不惜以辞害意;而把经过附会性阐发或修正之后的“范式”概念拿来指称某种理论模式,则无异于理论上的削足适履。范式概念的滥用已经带来了许多语义上的纠缠和用法上的争议;由此看来,在文学批评问题域中放弃范式的说法,而使用“形态”这样一个有形态学学理基础并经过严格论证和广泛运用的概念,能避免对考察对象的先入之见,也更符合揭示文学批评的哲学基础、批评观念、价值取向以及话语方式所构成的批评系统这样一个研究目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既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当代展开,也有对马克思主义文学命题的发展和重释,以及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提出并阐发的新问题。理论在现实情境的“质问”之下发生流变以应对挑战,这恰好

应和了赛义德对“理论旅行”这一现象的描述。现象总是对描述它的理论有或多或少的溢出,理论的每一次应用都会使自身的内涵和外延发生某种调整,对自身的边界和运作方式予以重新规定或确认。而历史情境的发生绝不以维系理论的稳定为考量,即不会总是限定在特定理论的有效解释域中活动;理论一旦离开源发地,就开始了时间和空间的旅行,与自己据以生成的初始条件相疏离。理论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会发生异变,被不同的文化环境所拣选和改造,以及会被不同的读者加以从心所欲的运用,这是思之可得的结论。赛义德由此区分了理论活动中的“理论意识”和“批评意识”,提示了固守理论教条的危险,凸显了批评活动的重要意义,并指出一种有生命力的理论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发生变异是一种必然。这对于我们面对离开原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诸理论依据其价值而非特定立场进行评判,有解蔽之功。

赛义德将他的“理论旅行”思想描述为:“相似的人和批评流派、观念和理论从这个人向那个人、从一情境向另一情境、从此时向彼时旅行。”^①一种理论在旅行至新环境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与原初不同的环境压力从而发生变化,这一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首先,有一个起点,或类似起点的一个发轫环境,使观念得以生发或进入话语。第二,有一段得以穿行的距离,一个穿越各种文本压力的通道,使观念从前面的时空点移向后面的时空点,重新凸显出来。第三,有一些条件,不妨称之为接纳条件或作为接纳所不可避免之一部分的抵制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才使被移植的理论或观念无论显得多么异样,也能得到引进或容忍。第四,完全或部分地被容纳或吸收的观念因其在新时空中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②

为了说明这一观念,赛义德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详尽地阐述了作为卢卡契的革命理论的“阶级意识”和“总体性”,如何在不同历史和社会情境下,“降

① [美]赛义德:《理论旅行》,载《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

② [美]赛义德:《理论旅行》,载《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

格”为戈德曼的学术探讨对象“世界观”，又经威廉斯指出总体性是“革命观念的形式”且带来自身的“方法论陷阱”这一理论旅行过程，描述了理论在哲学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三个领域中的变异。

在赛义德看来，对理论的借用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想挣脱自身直接所处的思想环境的束缚，就必须借用。……但是我们也需要高于理论和驾驭理论的东西，那就是从批评的角度认识到任何理论都无法包揽、封闭、预言它可能在其中有所用处的情境。”^①赛义德强调了“批评意识”的重要性，强调运用批评意识来整理、改造和提炼从理论中借来的东西。他指出，一种理论如果被不加批评地、重复地、毫无限制地使用，突破就会成为陷阱，因为理论或观念在流布的过程中很容易被简化、编码和制度化，正如卢卡契对物化现象的出色论述就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反映论^②，正如赛义德所说：“人的经验第一次被记录并获得理论表述时，它的力量乃是源于与之直接相关的真实历史情景，并被后者有机地唤起。当理论的后来形式不再能复制它的原初力量：因为形势已经平静下来并发生了变化，这一理论就会被降格、被减弱，被制成一种相对温顺的学术替代品。”^③

“理论的降格”可能引起两种情况：一是理论失去现实意义而退出实践领域，二是失去现实意义的理论由通过外部力量被教条地运用于现实。这实际上都宣告了理论的死亡。一种理论若想保持其活力，就不能失去现实依据，不能不对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作出回应，这就需要批评意识不断调整理论以适应现实。赛义德这样阐述他的“批评意识”：

“批评意识就是对各种情境之间的差异的感觉和意识，同时也意识到任何体系或理论都不能穷尽它所出自或者被它植入的情境。而且，最重要的是，批评意识要感觉和意识到由那些与理论冲突的具体经验或阐释所引起的对理

① [美]赛义德：《理论旅行》，载《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页。

② 参见[美]赛义德：《理论旅行》，载《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页。

③ Edward W.Said,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Boston: Harvard UP, 2002, p.436.

论的抵抗和反动。我甚至要说,批评家的本职工作就是要对理论进行抵抗,使理论向历史现实敞开,向社会、人的需要和利益敞开,指向取自处于阐释领域之外或边际的日常生活现实的那些具体事例。但是所有理论总是先划定阐释领域的范围,然后就固守着它的疆界。”^①

也就是说,批评意识是使理论向具体情境敞开的力量,是对理论的固化倾向进行抵抗的关键。在时隔约十年后的《理论旅行再思考》(Traveling Theory Reconsidered, 1994)一文中,赛义德对这一观点做了修正,提出了“理论越界”(transgressive theory)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旅行的理论在离开源发地之后,可能“不是变得温顺驯服,而是通过移至另一个位置来重新表述和重新肯定其固有的紧张状态”^②。他分析了卢卡契的异化理论对阿多诺的新音乐理论和后殖民批评家范农的暴力理论产生的不同影响。卢卡契试图展现无产阶级意识在消除异化、超越现实困境中的救赎作用,而阿多诺则在《新音乐哲学》中通过对舍恩伯格、伯格和韦伯恩等人的新音乐作品的分析,指出当代主客体对立的不可调和及超越的不可能:救赎和超越只不过是乌托邦幻想,掩盖了现代性的堕落本质^③。范农通过分析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异化和暴力状况,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关系取代了卢卡契的主客体关系;针对卢卡契对意识的强调,指出地理空间比历史重要,历史又重于意识和主体^④。从以上理论旅行和理论越界的例证中可以看到,一种理论在新的政治和社会情境中可能被降格和弱化,也可以被重新解释而获得活力;原创的理论既可能得到旅行的理论的不断诠释,也可能被后者持续否定。这一认识对我们审视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进一步领会马克思主义作为随着社会实践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提供了丰富的启发和佐证。

① [美]赛义德:《理论旅行》,载《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154页。

② 赵建红:《赛义德的“理论旅行与越界说”探讨》,《当代外国文学》2008年第1期。

③ See Edward W. Said,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Boston: Harvard UP, 2002, pp. 440-443.

④ See Edward W. Said,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Boston: Harvard UP, 2002, p. 446.

三、批评形态:从观念到方法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旅行”和“理论越界”,显然比“范式转换”的观念更合理。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书斋中的马克思主义,有把革命理论降格或弱化的一面,那么,它也有着在新的历史和社会情境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释和深化的一面;正因为有这样的重释和深化,有这样一种对理论中的非当下性因素的抵抗态度,生成于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得以调整自身,并针对20世纪的社会历史情境展开批判;这一切变化都源于回应现实情境的要求,有赖于“高于理论和驾驭理论”的批评意识的存在。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应着赛义德所说的理论旅行和理论越界的发展轨迹,那么被苏联定于一尊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则较多地显露着“理论的简化、编码和制度化”的现象。

因此,如果我们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社会使命意识并体现着“批评意识”的文学批评,并不存在定义上的同义反复。这里的“批评意识”针对的是文学批评所采用的理论本身,而文学批评正需要以这种经过“批评意识”洗礼的理论来面对文学现象。这里,我们提出用“批评形态”这一概念来取代“范式”,目的正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这些体现着批评意识的文学批评活动的整体面貌。

批评形态这一概念是从美学和文艺学领域的形态学研究中引申而来。形态学原属生物学的分支学科,以生物体外部形状、内部构造及其变化为研究对象;后来又被语言学所接纳,成为现代词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着重研究词的内部结构及其形态变化。20世纪以来,形态学被运用于美学和文艺学研究,先后出现了K.季安杰尔的《长篇小说形态学》、B.普罗普的《童话形态学》、托马斯·门罗的《艺术形态学作为美学的一个领域》以及M.卡冈的《艺术形态学》等著作或论文,对艺术理论或文本的外部形状、内部结构及其形态变化的现象和规律进行研究^①。托马斯·门罗从分类研究的角度阐发了“形态学”的

^① 参见赖大仁:《形态学与文学批评》,《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5期。